

蒋介石与抗战初期的中苏关系

(美) 约翰·W·格威尔著 王 静译

一、1937年7月7日，当中日战争爆发时，蒋介石并不认为，单靠中国的军队能打败日本人。确切说，他的赢得战争的根本战略主要放在以下三个因素上：A，延长军事抵抗阻击日本；B，争取苏联和西方国家介入战争；C，制订一项可接受的方案暂时与日本妥协。这三个因素是决定中国最终胜利的根本。

1937—1938年，英、美两国都不可能认真考虑对日采取军事行动。也没有迹象表明，蒋介石曾幻想他们那样做。美国恪守孤立主义，而英国在安抚日本还是追随美国的问题上举棋不定。英、美两国都被国内深重的危机搞得焦头烂额，所以只能听任其在远东军事形势的恶化。当时，蒋介石对他们最大的希望是：对日本采取严厉而有效的经济制裁。

与此同时，蒋期望苏联而不是英美的军队直接介入中日战争。蒋介石希望，当中国军队拖住日本，而英、美、荷等国又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时，苏联会介入抗战。许多因素使这种希望看起来似乎是可能的。苏联是日本向满洲渗透的宿敌。1931年9月日本占领满洲后，日、苏关系处于风雨飘摇中，两国随时都有打起来的可能。三十年代中期，苏联的工业和军事实力有了长足进步，其在远东的军事部署大大地加强了。英、美在远东军事势力很小，而苏联在满洲、朝鲜边界屯有强大的陆军和空军，且与日本只有一狭窄的水域相隔。蒋希望，一旦日本人陷入中回大陆的汪洋大海而实力受损后，苏联将出兵中国打击日本，这样，日本被迫两线作战，而中苏联合摧毁日本。

在战争最初的十八个月中，在外交方面，中苏两国的利益有很大的一致性。中国坚决支持莫斯科的呼吁，要求西方国家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同时，莫斯科在劝说西方国家对日实行制裁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蒋介石，他们都希望看见一个包括中华民国、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内的“反战和平阵线”的出现。蒋认为，一旦“和平阵线”建立，这将为苏联欧洲部分边境的安全提供保证，从而允许，起码会宽容苏军在远东的行动。蒋深知，莫斯科最担心两线作战，而和平阵线的出现，将会稳定欧洲形势，这样，苏联就有可能在远东采取强有力的政策。

1937—1938年，在对苏问题上，蒋有三智囊，他们是：A，1936年10月至1937年11月出任中国驻苏大使的蒋廷黻；B，南条政府的立法院院长孙科；C，国防部副总参谋长、继蒋廷黻任驻苏大使的杨杰。这三个人个性和政治观点迥异，但都对抗战初期的中苏关系有重大影响。

三人中，蒋廷黻对苏联介入抗日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上，持悲观看法。在整个三十年代他始终坚持认为，莫斯科不会为了中国人的利益而与日本人打仗。在他看来，中国人关于苏联将介入战争的错误看法是极为有害的——它鼓励中国去打仗，但战争将给中国造成巨大的损失。他坚持认为，与其从事一场错误的战争，使中国的情况变得比以前更糟，不如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让步。其基本思想是，如果没有打赢的实实在在的希望，一个国家不应从事战争。

1935年，蒋介石根据蒋廷黻的建议处理对苏关系。

杨杰、孙科也主张加强同苏联的关系，但在苏联是否介入战争问题上，他们与蒋廷黻持不同观点。

三十年代中期，杨杰逐步形成了一种牢固的信念，即苏、日必战。1933—1934年，他对欧洲和苏联进行了一次军事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中苏联合将最终战胜日本。由于他是副总参谋长，所以其观点很快为蒋介石所闻。1937年底，蒋派杨去莫斯科，名义上是考察苏联的国防工业，实际上是游说斯大林，请其扩大对华军事援助。1938年5月12日，杨接替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直至1940年4月18日。1937—1938年，杨不断向蒋传递信息，说苏联很快会介入中国抗战。他还被授命，努力去挑起日、苏冲突。

孙科是蒋的第三位苏联问题专家。当时，他领导着国民党内的左翼集团。其目光所及，看到的是中苏友好与中国内政走向民主的联系，并积极支持中苏加强联系。他有一种天真的看法，即苏联将支持为正义面战的国家和人民，并认为，一旦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苏联将站在中国一边，介入战争去抗击日本。蒋廷黻认为，孙的观点是致命的。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蒋廷黻建议蒋介石，派孙率专门代表团赴苏，让其考察苏联，掌握苏联不会介入战争的第一手材料。然而，蒋介石根据自己的判断拒绝了蒋廷黻的建议。直到1937年11月，蒋才派孙以秘密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赴苏，寻求苏联援助。孙科一行于1938年1月抵达莫斯科。1938—1940年，孙逐步放弃了他关于苏联外交政策上的种种错误观念，但直至战争结束，孙仍坚持，苏联方向是中国走向进步的唯一选择。

二、1937年8月中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这构成了中苏在1937—1939年亲密合作的基础。其实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互助条约的谈判，早在1932年中苏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时就开始了。当时，中国外长罗文干非常支持这一条约。在1933年4月，他甚至向南京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递交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的草案。

国民党中执会委员、蒋介石的积极追随者陈立夫，回忆了他1935年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就中日战争中苏联对华援助可能性进行了讨论。陈回忆说，1932年，罗文干建议订立中苏互助条约，但鲍未接受。鲍认为，这样的条约“太危险”。对此，陈解释说，这种条约的签订意味着苏联在华影响的增加，而日本对此会作出迅速反应，但中国实力薄弱，在日、苏战争中，中国不会给苏联多少现实的援助。1936年2月，陈经德国率秘密代表团访苏时，他继续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会谈。莫斯科仍很谨慎。当然，协议虽未达成，但会谈已有所进展。

1936年底，当蒋介石一面和谈，一面备战时，他希望获得苏联潜在的支持。1936年10月，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时，其主要使命之一，就是中苏条约的谈判。在莫斯科的第一年里，蒋就中苏互助条约，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与苏官员谈判。外长李维诺夫表示不愿签订互助条约，因为他担心，如果苏联介入远东冲突，将有损其国际形象，同时，西方国家会本能地怀疑苏联的意图而减少对中国的同情。在李维诺夫看来，只有在英美某种程度上支持中国抗战时，苏联才能支持中国；在支持中国问题上，苏联不能走在英美的前面，但也决不远远落在他们的后面。

不过，在拒绝互助条约的同时，李维诺夫表示，愿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为向中国贷款购买苏联军火提供政治基础。但他强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应在南京而不是莫斯科签字。蒋廷黻认为，这大大降低了条约的重要性。显然，蒋廷黻和李维诺夫都懂得，来自苏联的条约

是限制苏联义务的象征。不管怎么说，蒋廷黻禀报蒋介石说，要订立中苏互助条约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互助条约失去存在的必要性。他向蒋建议说，要争取包括其他列强在内的多国联盟，而不仅仅是中苏联盟。

显然，李维诺夫的谨慎态度被斯大林否决了，因为卢沟桥事变爆发一个月，苏联事实上曾建议中国政府订立互助条约。1937年6月5日，鲍格莫洛夫大使照会中国外长王宠惠说，既然中苏两国在远东都谋求类似的“环境”，那么苏联希望出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鲍说，中国没有侵略野心，所以苏联把强大的中国看成是远东和平的保证；相反，弱小的中国会引发战争。据此，苏联政府建议，中国政府应倡议英、美、法、荷、日、苏等召开会议，订立太平洋地区互助公约。中国政府一旦提议，苏联将积极响应，并疏通其他国家，劝其参加集会。如果不能签订互助公约，苏联政府准备与中国单独缔结互助条约——他已将条约草案呈交王宠惠。在鲍格莫洛夫看来，双方缔约之前，召开一次国际安全会议是必要的，因为国际会议的成果可能使中苏互助条约失其必要性。王宠惠会责问鲍，苏联政府为什么不自己倡议召开太平洋会议，鲍说，由苏联倡议可能会引起种种怀疑。

令人惊奇的是，王宠惠没有立即将这一重要建议向蒋介石汇报。直到7月8日，即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一天，王才将把这一消息告诉蒋介石。据当时中国外交部苏联司司长周希才说，王宠惠对苏联的建议持怀疑态度。王认为，如此国际会议，中国单独倡议是不合适的，应与英、法、美共同倡议发起。根据周希才的说法，“七七”事变时，王宠惠和鲍格莫洛夫正就此问题进行会谈。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抛弃了王宠惠的谨慎态度。7月8日，蒋召王宠惠、孙科上庐山。卢沟桥事变后，能否制止事态的扩大，蒋没把握，但他已感到有必要认真准备，以防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他认为，若事态扩大，这将是全面抗战的开始。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与苏联达成协议，争取其军事援助和中苏互助条约签订。

根据周希才的说法，当王宠惠、孙科去上海重新与鲍格莫夫洛开始会谈时，鲍认为，此时讨论互助条约已经太晚了。鲍说，这一条约的目的，旨在阻止战争的爆发，而现在，战争已经打起来了。如果在日本1931年入侵满洲时签订类似条约，可能遏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而今已为时太晚。此外，若苏联现在与中国订立这样的条约，它很可能遭到日本人的袭击。但苏联不准备对日作战，鲍说，刺激日本人进攻是不明智的。但他又说，现在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是合适的。

除了接受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别无选择，因为这毕竟是除此之外的最佳选择。1937年8月1日，蒋批准这一协定。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由王宠惠、鲍格莫洛夫在南京正式签字。8月29日公布这一条约，并于8月21日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通过。然而，令人纳闷的是，直到1938年4月26日，由蒋介石任军事委员长的最高军事委员会才将这一条约送交立法院批准，并交由行政院执行。这种延宕可能是反映了对西方国家对此作出反应的深深怀疑。1938年5月16日，立法院批准了这一条约。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核心内容有二：A，它为中华民国争取大规模的军事贷款和援助，提供了政治基础；B，它保证在冲突整个时期内，双方都不得与日本发展贸易关系。它规定，倘两缔约国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在冲突全部时期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1938年5月16日批准这一条约时，条约的这项条款具有重大意

义。

蒋介石也认为，这一条款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对苏联可能进行的欺骗有某种遏制作用。但是，蒋忧虑，在遏制苏联可能的欺骗问题上，条约如何才能最终起作用。8月1日蒋批准条约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苏联可能用这一协定向日本施加压力，尔后与其签订类似的协定以确保其中立地位。在整个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头上始终笼罩着一种阴影，即担心苏、日“瓜分”中国。正如经验丰富的邵力子在公开分析这一条约时所指出，莫斯科中止对日贸易的许诺，是以中国不参加德、意、目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为条件的。

三、南京希望，中苏条约能成为包括英美和其他西方列强在内的太平洋体系互助公约的组成部分。卢沟桥事变后最初的几个月里，中国官员希望西方列强对日采取强有力的行动。7月16日南京政府向英、美、法、比、荷、意、德、苏等国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控诉日本入侵华北，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同时也违反了巴黎和会的精神及国际联盟的惯例。从7月21日至27日，蒋介石召见英、美、意、德、法驻华大使，请求他们支持中国的抗战。

南京呼请西方列强与中苏联盟合作的努力，集中表现在1937年11月3日至24日召开的布鲁塞尔九国会议上。苏联和美国出席了大会，但日本和德国没参加。据当时中国驻比利时大使、会议代表之一钱泰说，会议开幕时，中国代表对此予以极高的期望。他们尤其希望会议作出决议，给蒋介石以物质援助——军事装备、军火、贷款和租借物资，所有这一切将使苏联军队出现在满洲边界和英、法、美海军出现在太平洋成为可能。中国代表认为，西方列强起码会同意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

南京的官员对西方列强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并不抱乐观态度。布鲁塞尔会议前一个星期，外长王宠惠秘电中国代表，指示对待会议的方针。王说，会议是解决中日冲突的唯一机会。但我们应对出席会议的所有国家采取温和态度，以免使其难堪。“指示”还流露了一种希望，即要求会议本着1922年九国会议的精神解决中日争端。如果会议不可避免地失败的话，我们的目标是劝说列强对日实行制裁。此外，在会议上，中国代表应“积极寻找途径，鼓励英、美支持苏联出兵抗击日本”。

南京关于苏联和西方共同对日行动的构想，与莫斯科自己的安全战略是吻合的。1937年9月13日《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分析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与广泛的互助公约间的某种联系。文章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与和平是不可分割的，远东的事件将影响西方，东、西方应共同维护和平。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赢得世界和平与共同安全的新工具。10月20日《真理报》上的另一篇文章说的更为明确：考察了欧洲和远东形势的最近发展后，文章认为，日本和德国是两个“企图改变现状的列强”，他们企图通过新的世界大战以实现其目的。文章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最担心的是，英、美联合起来维护中国的门户开放。

莫斯科也象南京一样，希望布鲁塞尔会议向反战阵线迈进一步。它派外长李维诺夫参加会议，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苏联对布鲁塞尔会议是何等重视。在布鲁塞尔会议上，李维诺夫坚决支持中国的呼吁，号召“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日本实行制裁。李维诺夫在会议上说，缓和中日冲突的努力曾尝试过，但失败了，我们认为，应积极采取措施遏制日本，且苏联准备加入制裁日本的行列。

遗憾的是，美国所关心的是如何安抚日本，而不是联合苏联反对它。美国代表团团长戴维斯提议，组织一个小型委员会，希望日本参加而将苏联排除在外，以便考虑通过一项方案。这一提议激起李维诺夫的极大义愤，他以苏联受歧视为由当即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对重庆来说，这是外交上的所受的严重打击。据钱泰的说法，苏联退出会议后，会议再也没有讨论支持中国的“积极步骤”。中国外交官蒋廷黻对英美两国把苏联排除出远东问题之外的“不懈努力”深感疑惑。蒋廷黻渐渐认识到，在国联或布鲁塞尔会议上、苏联的“任何”举动，都是华盛顿和伦敦所极不愿看见的——蒋廷黻认为，这种态度是鼠目寸光。

最后布鲁塞尔会议通过一项方案，鼓励中日两国通过其他国家的帮助尽快结束冲突。中国对会议的结果大失所望。寻求西方支持的失败，使中华民国更多地依赖苏联。

九国布鲁塞尔会议期间，莫斯科不断暗示南京政府，它将介入中日战争。据蒋介石的说法，布鲁塞尔会议期间，斯大林曾破格接见中国驻莫斯科使馆的参事张冲，表示：“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卓越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

四、许多中国人希望，随着英美对中国采取支持态度，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会为苏联介入中日战争奠定基础。这种想法很普遍，关于这点，蒋廷黻回忆录可以提供佐证。蒋回忆说：“当我出使苏联的消息公布后，各方都寄予厚望。朋友、公私团体，予我一连串的招待。每次聚会中，大家都希望我，要求我能设法使苏军与我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侵略。他们相信我一定能进行此一重要工作，他们希望，不仅是进行，而且一定要完成此一工作。这些聚会中所表现的，反应出一般人的情绪。

蒋认为，莫斯科利用了中国人期望它介入中日战争这一点，推动中国去与日本人发生正面冲突，并在战争打起来之后使中国坚持战斗。莫斯科于1937年6月递交中苏互助条约草案，很可能是苏联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形势下，为鼓励中国的勇气而做的努力的一部分。在其回忆录中，蒋说，鲍格莫洛夫不断使用这种手段鼓励中国的战争狂热，特别是在接见中国普通公民、一般从政人员和新闻记者时，鲍暗示，中日一旦打起来，苏联准备向中国提供必要的援助。根据蒋的说法，在与中国官员接触时，鲍是非常谨慎的。但至少在一种场合，鲍向蒋透露，苏联愿意缔结互助条约，在中日战争中，苏联将给予中国实际军事援助。鲍的表示可能超出了苏联政府授给他的权力。蒋廷黻猜想，鲍格莫洛夫认为日苏交战会使斯大林垮台。

战争开始后最初的十八个月中，蒋介石试图劝说斯大林下令苏军介入中日战争。斯大林在拒绝蒋的呼吁时是非常谨慎的，因为他担心，一旦处理不好，会导致蒋与日本人媾和。

从其顾问那里，蒋介石不断收到关于苏联介入战争可能性的截然相反的建议。在其回忆录中，蒋廷黻说：“1937年冬是我最感困难的一个冬天。因为杨杰将军呈给委员长的电文中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而我的电文却表示非常失望。”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蒋廷黻呈交蒋介石一份极为悲观的报告。报告中，他非常肯定地说，苏联不会介入中日战争，除非它自身遭到日本人的袭击。当外长王宠惠在国防最高会议秘密会议中宣读其报告时，孙科断言，蒋廷黻在莫斯科的使命“失败了”。因为他“误解”了苏联的意图。蒋回忆说，“据此，也许还有其理由，我被调回”。

根据1938年底杨杰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会谈，他认为苏联即将介入战争。11月12日，杨杰给蒋介石拍了两封电报，谈了苏联介入战争的可能性。在第一封电报中，杨援引斯大林的话说，只要日本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遏制日本军国政府，苏联就介入战争。斯大林总结说：“因此，苏联对日本开战要等待时机之到来。”杨的第二封电报总结了他与伏罗希洛夫的会谈。根据杨的说法，伏罗希洛夫同意蒋介石的意见即苏联介入战争将最终奠定远东和平的基础。但伏罗希洛夫又说，苏联有种种忧虑，因为苏联一旦介入远东战争，西

方“将接踵而至”，在两线作战中，苏联没有成功的把握，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苏联不得不进一步作准备。但伏罗希洛夫说，杨可以转告蒋介石，这种准备将是“非常迅速”的。如此巧妙的暗示再次鼓舞了中国继续抗战的勇气。

12月6日，来自杨的另一封电文呈交到蒋介石手里。在电文中，杨谈了他就苏联“出兵”这一实质性问题与伏罗希洛夫的会谈情况。杨说，斯大林担心，苏军介入可能导致全世界对它宣战。所以，苏联只能给中国以物质援助。杨继续说，斯大林也知道中国抗战的艰难困苦，但他相信，“只要中国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将属于中国。最后杨评论说，尽管苏联有种种担忧，但它介入战争“不是不可能的”。杨建议说，中国应鼓励英、美、法等国给苏联“适当”保证，从而让苏联介入中日战争。

同在12月份，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直接拍电报给蒋介石，解释其介入战争的种种困难。电报说，如果苏联出兵中国，且不说日本会对此作出直接反应，就是“整个世界也会说，苏联是侵略者，这样对日本的同情将在世界各地迅速滋长”。这种形势无论对中国还是苏联都不利。只有当九国列强或者至少是其中几个主要国家同意在对日问题上与苏联合作时，苏联才能立即出兵中国。斯大林说，“一旦出现这种形势，苏联将说话算数”，而且他还说，要更改这一政策只有通过一个半月举行一次的最高苏维埃会议。同时，苏联将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华援助。在其尚未对苏联介入问题封口时，斯大林再一次说：“不是现在！”

1937年12月德国大使曾调停中日冲突，并提出了和平建议，蒋介石把这些透露给了斯大林。这是暗示斯大林，如果苏联的支持不够充分的话，蒋介石可能对日妥协。言外之意是，中国将站在反共产国际的轴心国一边。不过，令蒋介石吃惊的是，斯大林认为，蒋介石不会置其政治生命于不顾而接受日本屈辱的和平条件。12月26日，苏联驻武汉大使再次强调了斯大林的这封电报，他告诉蒋的财政部长孔祥熙，苏联对中国深表同情，并尽可能扩大对华援助，但单方面出兵是不可能的。

12月13日南京沦陷，南京人民惨遭杀戮。据蒋廷黻说，杨杰将军曾与伏罗希洛夫会谈，涉及到若日本一旦攻陷南京，苏蒋将介入战争。蒋介石根据杨与伏罗希洛夫的会谈，打电报给斯大林，要求苏联介入战争。斯大林通过李维诺夫向蒋廷黻转达了他的否定答复，李维诺夫说，杨将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1937年11月，为了寻求苏联对华扩大援助，蒋介石派孙科赴莫斯科。1938年初，孙科抵达莫斯科。2月4日，孙与斯大林初次会见，两人边饮边译，直至深夜。会谈中，斯大林强调，在赢得苏联出兵的过程中，中国要有耐心。2月7日，孙将会谈内容向蒋汇报。斯大林说，现在的国际形势不允许苏联出兵，有必要等待时机成熟。

1938年4月，日本从山东南部向徐州推进，蒋介石再次要求苏联出兵。3月10日，蒋电报杨，令其与伏罗希洛夫会谈，迫使苏联出兵。蒋说，日本将八至十个师南调，北满空虚，若苏联此时出兵将效果显著。根据2月4日孙科与斯大林的会谈，蒋还训令杨说，即使苏联军队不能直接介入，杨也应敦促伏罗希洛夫，让苏军向满洲、朝鲜边界集结，以牵制日本调动更多的部队去南方与中国军队作战。蒋说，这点很重要。

5月21日，徐州陷落，武汉保卫战开始。武汉是战略要地，它再陷落将是也的确是对中国抗战的严重打击。武汉保卫战标志着战争到了决定性阶段。日本战线拉长且兵力不足而疲惫不堪，相反，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极为高涨，国共两党的团结也空前加强，若能遏止日军，那将是在武汉。若苏联介入，则影响更大。

武汉保卫战打响后，汉口《大公报》出版一本书，分析了苏联介入战争的前景。以《大公报》主编张季鸾为代表的中国人对1938年年中的中苏关系持乐观态度，这反映了中国人在那关键时刻的思想。褚玉坤在《动荡中的中苏关系》一文（中文版）中，声称，苏联的实力不足以同时在欧洲和远东对付两个强大的敌人，但是，如果美国愿意与苏合作而对日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那么苏联就会出兵中国援助抗战。英国迟早会采取强硬政策的，在这种形势下，苏日开战势在必行。最后书写道：“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战斗，国际形势终有一天会改变的，苏联出兵远东的这天终将来临。”

6月，在日军向武汉移动时，蒋介石不断向苏联施加压力，迫其介入战争。当时，德国政府内部的争论已经结束，开始执行里宾特洛夫外长的政策，支持日本；希特勒也同意与日结盟，放弃其在中日战争中的中立立场。这一重大政策的直接影响是，德国召开了它在中国军队中服役的军事顾问，包括颇有能力且为蒋所信任的法根豪森。3月2日，蒋拍电报给继蒋廷黻之后出任驻苏大使的杨杰，指示他请求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派一名能干的顾问如布柳赫尔（即加伦）来武汉作其“总顾问”。当时，布柳赫尔是苏联远东军总司令。任命他为蒋介石的总顾问去取代法根豪森，将是苏联支持中国的强有力的证明。日本人可能把这看成是苏联对它的挑衅。6月28日，蒋介石再次拍电报给杨杰，寻问苏联召回其大使是否意味着对华政策的改变。蒋说，最近德国已改变了政策，并强调：“不久，日寇和德国必将对苏联采取特别行动。”其实，蒋是暗示斯大林，中国完全站在苏联而不是轴心国一边；而敌人已经团结起来了。在德国发动进攻前，苏联联合中国迅速击败日本是明智的。

1938年7、9月，苏朝边境发生激烈冲突，这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认为苏联这次将介入中日战争了。发生在哈桑湖西侧的张鼓峰事件，使1938年7月中旬武汉宴会上的这种气氛弥漫到了顶点。据蒋廷黻说，当他从莫斯科返回中国时，出席宴会的多数人认为，这是日苏开战的标志。蒋回忆说，有人甚至走得更远，甚至宣称日本财政将于九月崩溃。蒋廷黻认为，那只是一次边界冲突，起于双方的带兵官，并非双方政府事先下令他们开战的。蒋认为，就布柳赫尔本人来讲，他的行动不仅未受上级指令，而且可能是违反上级规定的。他觉得宴会上许多人的乐观主义发言是为了取悦于蒋介石，不过蒋介石在会议讨论结束时说：“廷黻说的对，散会吧。我们要自己努力，就当张鼓峰事件没有发生。”由是蒋廷黻得出结论说，“如果说蒋介石对苏联直接军事援助曾经有任何幻想的话，他一定是放弃这种幻想而面对残酷现实的第一人。”

其实，蒋介石可能不象蒋廷黻所说的那样，充满了幻变感。蒋介石认识到苏联介入的可能性正在减少，但即使他本人希望别国介入，对他来说，最好还是轻蔑这种思想——起码在宴会的那种气氛中他应那样做。例如，在1938年1月底，他提醒共同僚们，战争初期中国所犯的错误的中，最大的是认为列强会共同制裁日本，而中国可以实行防御战。不管蒋介石在1938年年中他是多么希望苏联出兵，但他不会在其部下中不适当地鼓励这种希望。

7月27日，蒋介石打电报给杨杰，寻问苏联对张鼓峰事件的反应。他说，日本正集中其南方部队，希望将侵华战争搞一段落，同时，日本可能建议成立边境问题委员会来冲淡日苏关系的紧张气氛，以赢得时间，从容地集结其部队对付苏联。蒋说，日本的意图很明显，苏联政府不应上当受骗。蒋令杨寻问苏联对待日本采取何种立场。或许是形势紧迫，或许是对杨的努力不太满意，蒋又问杨，他是否在苏联大使被召回后，会见过苏联大使，并问苏联大使何时返回中国，蒋命令杨迅速答复。8月2日的电报，蒋又重申了这些问题，并要求杨证

实下列报道：在张鼓峰事件中，苏联伤亡200人，飞机被击落5架。

8月10日，外长李维诺夫和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在莫斯科达成协议，张鼓峰事件和平解决。蒋介石的希望再次落空。后来，蒋介石在日记中承认，当他获悉张鼓峰事件和平解决时，他是多么的痛苦。他认为，如果日本建议与中国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是出于真诚的话，它就不该在张鼓峰失利后，如此逆来顺受。

8月7日，在李维诺夫和重光葵协议公布前不久，孙科给蒋介石拍了一封很长的电报，概述了苏联不能介入战争的理由。孙说，苏联担心，一旦它介入战争，中国可能与日本人单独媾和。苏联还担心德、意利用其在远东作战的机会，从西部发动进攻。但欧洲形势已有所改善，孙说，英、法正加强合作，牵制德、意。因此远东形势的变化不会引起欧洲局势大的动荡。所以中国应对苏联充满信心。孙还强调，中苏合作不能局限在战时，应持续到战后。为了寻求与苏联的持久联盟，中国应采取与之相同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政策。孙还说，莫斯科担心，中国战后会变成法西斯。为了消除苏联的这种忧虑，中国应推行土地改革和平均地权，发展工业，并停止对中共八路军的歧视。孙科评论的第一部分——关于中日和谈的危害，欧洲局势的变化以及中苏进一步团结——可能忠实地反映了东道国苏联的看法。这对传入中国的关于苏联不会介入战争的观点显然有重大影响，从而鼓舞了蒋介石的希望，认为苏联会介入战争。孙关于国内形势的评论是他本人的思想，还是苏联官员向他陈述的观点，关于这点，目前尚不清楚。

9月下旬，武汉保卫战进入最后阶段，日本从三个方向进攻武汉。9月30日，蒋介石召见苏联驻华大使，敦促苏联采取军事行动遏制日本。两天后，蒋又拍电报给杨，通知其与苏联大使会谈的内容。蒋命令杨问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他们是否准备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蒋建议，以苏法、苏捷协定的方式订立中苏互助条约。鉴于当时四国列强慕尼黑协议的形势，蒋令杨转告斯大林：

“中国方面认为，此时苏联应对远东侵略者采取更为积极的制裁措施和更加接近中国的步骤……目前，欧洲局势稳定有望，所以苏联不必担心自己的后方。抓住现在的有利时机教训远东侵略者日本，将威慑德国，使其日后不敢制造事端。你应告诉他们（指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中国人民始终认为，苏联是支持被压迫民族的，在任何情况下，苏联都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可靠朋友。我们的抵抗已坚持十五个月了，我们自己的力量已达到了极限，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困难、最关键的阶段。苏联不会希望看到中国功败垂成、远东侵略者耀武扬威、和世界局势无法逆转吧！”

蒋让杨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全面而诚挚地阐述这一推论。杨应积极疏通苏联外交官员，尽最大的努力去鼓励苏联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蒋令杨从速汇报。10月9日，蒋再次召见苏联大使。

当然，在1938年苏联并未直接介入战争。10月19日，蒋下令撤出武汉，10月21日，日本占领武汉。当蒋介石1937年率中国抗战时，他曾希望苏联介入战争，莫斯科也曾鼓励过这种希望，但当中日进行血战时，苏联却极力避免卷入战争，当蒋意识到这点时，他一定是很痛苦的，尽管这仅仅是人们的猜测。

一旦认识到苏联不会介入战争，蒋介石的政策开始改变了。武汉失守后，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虽说苏联继续支持中国抗战直到1941年6月，但援助的规模大大地缩小了。

（下转第85页）

这又完全和对外政策有关。

为了使道义和政策重新统一，仅仅批评过去是不够的，虽然批评过去很重要。毫不夸张地说，这个任务是历史性的。值得深思，大国转向实行道义政策会给整个世界局势带来什么影响。因此，这要求我们采取新方法并鼓足勇气；不仅要在国家这一层次上解决这一问题；而且，主要是在整个社会的层次上完成这个任务。

只有社会通过最高立法机关来监督对外政策，社会监督才能成为保证重新确定对外政策的道义原则的真正杠杆。但是，为此需要整个社会自由地决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态度；打破把对外政策理解成神圣不可侵犯——普通人不能了解的机密——的框架。社会应该理解，属于社会本身不可剥夺的权力还有：评议对外政策，不仅要求它的执行机关汇报自己的工作，而且要求它撤销那些违反公共道德准则的决议，即对国家真正的长远利益不负责任的决议。

当然，应该说明一下，只有在社会中恢复精神和道德的优先地位和社会最大限度地掌握关于国际性问题（关系到国家安全的秘密除外）信息的情况下，社会才能实事求是地给对外政策做出负责的评价。至于第一个条件，坦率地说，还远远没有实现；但是，这是一个特殊而严肃的话题。第二个条件比较简单——它可以通过立法来实现，比如出版法。

到了抛弃那种陈腐的工作作风的时候了——评论国际时事必须严格地和官方立场保持一致。不转载外面的否定性反应的意见，今天看来是多么愚蠢。现在，新闻界在国际时事方面几乎处处坚持自己的观点；世界并没有因此而被颠倒过来。

最后，如果我们赞成国家之间的关系非意识形态化；那么，我们处理国际问题时，就必须扔掉思想标准的套子。有一点很清楚——实现上述条件的道路是很难的；不深化国内的民主改革，这些条件只能良好的愿望和理想，而不会变成现实。

（译自〔苏〕《新时代》1990年第7期。作者为《新时代》的“国际时事专栏”主笔，历史学博士。）

（上接第93页）

在口头上，双方仍高喊友谊和共同利益，但新的问题出现了。最重要的是，两国领导人把眼光洒向别处，开始寻找新的可靠的外国伙伴——斯大林面向柏林；蒋介石则面向华盛顿。这种趋向分流终于导致抗战初期十八个月中形成的中苏联盟解体。

——译自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办《政治学季刊》第102卷第2号。作者为美国佐治亚工艺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政治学教授。本文原题为《蒋介石寻求苏联介入中日战争》。